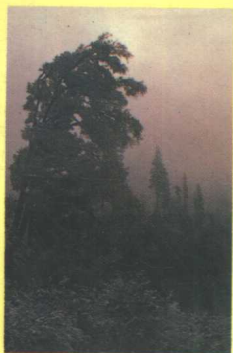


中国现代散文精品

胡适卷



陕西人民出版社

中国现代散文精品

胡 适 卷

淳 夏 编选

陕西人民出版社

(陕)新登字001号

中国现代散文精品

胡 适 卷

淳 夏 编选

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北大街131号)

陕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汉中地区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9.875印张 5插页 219千字

1993年8月第1版 1993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 000

ISBN 7-224-02426-0/I·601

定价：6.35元

序 言

当许多朋友在阅读或撰写着漂亮的文章时，不知道会不会想到七十多年之前，有一位名叫胡适的人，曾为此作出了极大的贡献，是他首先于当时产生了“文学革命”的想法，认为“历史上的‘文学革命’全是文学工具的革命”，他极力主张“今日之文言乃是一种半死的文字”，“今日之白话是一种活的语言”，“白话可以产生第一流文学”（《四十自述》），于是发表了著名的《文学改良刍议》，大力提倡白话文学。陈独秀又进一步拓宽和深化了这种思想，发表著名的《文学革命论》，“文学革命”运动从此就轰轰烈烈地展开，完成了在整个国家中用白话文从事写作的伟大壮举。

胡适所写出的大量散文，无疑是在实践自己“白话是一种活的语言”的主张。就是在今天读起他的这些篇章来，确实依旧能够觉得是十分的鲜明和灵活，还可以津津有味地念下去。他多数的散文，是以说理和议论为主的篇章，侧重于抒情和叙事的篇章不多，而且它说理与议论的方式，跟“五四”以后兴起的揭露社会时弊和思想锢疾的杂文，也很不一样。那种杂文往往不是面面俱到地写来，而集中攻讦时弊或锢疾的要害之处，容易达到刻意渲染，淋漓尽致而又一针见血的地步，正是这种犀利的气势可以促使读者深思。而胡适的很多篇章与此都迥然不同，是想去说明一个平常和普通的道理，总是力求说得头头是道，面面俱到，结构得不好就容易显出平淡和琐碎，然

而他的那些篇章，却几乎都避免了这样的毛病，总是把道理说得明白晓畅，形象生动，让人读得兴味盎然，像这样的本领实在不能不令人折服。

最为典型的例子，是《新生活》这篇说理的小品文。当通俗白话报刊《新生活》于1918年创办时，胡适应邀为它的创刊号写成此文。在时光消逝了十多年之后，胡适于《大众语在那儿》这篇文章中，还很得意地回忆那杂志的主编告诉过他，在此文发表的那一年中间，还只有它“是老百姓看得懂的”，所以能够让“老百姓看得懂”的重要原因，是在解答“新生活是什么”这个抽象的问题时，胡适单刀直入地列出“新生活就是有意思的生活”这个答案之后，并不搬弄大量深奥的概念进行推理，而是从揭示人们为喝酒吵嘴，和为打牌输钱而懊悔这些大家都熟悉的琐事说起，归纳起来认为这种无聊的“糊涂生活”，说不出“为什么这样做”的目的，就是“没有意思的生活”；相反的，回答得出“为什么这样做”的事情，才可以说是“有意思的生活”，才算得上是“新生活”。将道理说明白之后，胡适还进一步发人深省地界定：“人同畜生的分别，就在这个‘为什么’上”，从而就水到渠成和严肃认真地“希望中国人都能做这种有意思的新生活。其实这种新生活并不十分难，‘只消时时刻刻问自己为什么这样做，为什么不那样做，就可以渐渐的做到我们所说的新生活了。’”

“五四”启蒙主义的一个根本目标，就是要让我们整个民族都能够过上一一种有意义的新生活。胡适通俗易懂和言简意赅地说明了这个问题，应该说是写得很精彩的，其根本原因无疑在于他的写作态度，是坚持要贯彻“明白清楚”，“使人容易懂得”（《什么是文学》），而达到这个目标的重要方法，又

在于多用形象鲜明的实例与细节，经常辅之以比喻的语言。胡适多数说理性的散文，都是这样表达得很生动和有利的。譬如他用北京街头的清道夫扫地这个细节，比喻吴虞的“打扫孔渣孔滓尘土”（《〈吴虞文录〉序》）；用“缠过脚后来放大的”“鞋样”，比喻自己“这五年来的新诗”（《〈尝试集〉四版自序》），都是极好的例证。尽管并非篇篇都是这样明白易懂和生动形象，基本的风格却是很一致的，这样就使读者易于一目了然，读得很有兴味，正是这些手法成了胡适散文写作的基本特征。许多人都说胡适的文章好读，大概就是指这而言的。不过天下的事情往往是有一利即有一弊，胡适由于过分地追求这种通俗易懂的效果，因此就不太注重对自己所要阐发的道理，进行深入一层的剖析，他对此是有自知之明的，说是自己的“长处是明白清楚，短处是浅显”（《四十自述》）。

虽说是在讲述某一种道理时，往往会显得肤浅和显露，缺乏深刻的思想内涵，不过由于胡适曾发表过许许多多的见解，累积和综合在一起，也就多少弥补了这样的毛病，显得相当的丰富多采了。像《贞操问题》抨击野蛮的封建伦理道德，《〈吴虞文录〉序》反对落后和僵死的传统思想，《易卜生主义》大声呼喊个性解放，《差不多先生传》针砭马虎和懒情的国民性弱点，《人权与约法》批评国民党政权缺乏法制与民主等等，多少显出胡适的思想见解闪烁着时代精神，具有明显的社会意义。他自然也有一些荒谬的思想主张，比如说曾提倡过“全盘西化”，贬损过民族的自尊心，还无视帝国主义对于中华民族的侵袭等等，都产生过较大的消极影响。

由于在共产党和国民党的长期政治斗争中间，胡适由倾向于后者和变成进一步支持它的中坚人物，他就不能不受到来自

共产党领导和影响的思想文化界的批判，直至五十年代掀起一场大规模的思想批判运动，这似乎都是由政治原因所造成的历史之必然。像上面所提到的胡适在批评国民党政府侵犯人权时，确实表现出他寄希望于腐败和专制的国民党政权，在当时看来眼光是庸劣的，因为他竟会充满苦心孤诣的心情，期待着这个政权消除独裁，变得清廉起来，纯属是与虎谋皮。鲁迅针对胡适的忠而获咎，受到国民党政府教育部的“警试”，讥讽他为“焦大的骂，并非要打倒贾府，倒是要贾府好，不过说主奴如此，贾府就要弄不下去”，因此“给他塞了一嘴马粪”

（《言论自由的界限》），充分揭示出国民党政府专制独裁的性质，指出他们与胡适的关系归根到底还是“主奴”的关系。

任何一个专制独裁的政权，为了延续自己永远不允许更迭的统治，也就必然会恐惧万分地镇压人民脱离他们控制的思想与行动，往往变得神经过敏，草木皆兵，从而要严禁对其进行任何实质性的批评，这几乎是政治学中一条铁的规律。不过就胡适的这种批评本身而言，也总比阿谀奉承要来得可取，而且把近代的“民主”与“法治”作为衡量一个政治优劣的标准，这无论如何是很合理的要求，也有益于整个民族的稳步前进。

在这几十年中的思想论争中，胡适最受诟病的另一个方面，是他始终持着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扬言“被孔丘朱熹牵着鼻子走的人，固然不算高明；被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牵着鼻子走，也算不得好汉”（《介绍我自己的思想》）。站在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立场，对此产生反感和义愤填膺的情绪，自然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不过对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来说，是决不会被任何人“牵着鼻子走”的，而是要求完全符合科学的认识论，从而形成自己的基本原理，并且随着时代的变迁去

发展这样的学说，因此就必然会抱着追求真理和修正错误的态度，正是像这样的光明磊落和胸襟开阔，所以完全能够从论敌的许多驳杂见解中，吸取有益于自己前进的东西。如果是凭着这种科学的精神，那么对胡适这些即使是肆意攻击的言论，也可以批驳和澄清其荒谬之点，而接受其合理之点，从而对于革命队伍的更好前进，对于整个民族的健康发展，都可以大有益处。自然在双方处于政治斗争白热化的时期，较难表现出这种心平气和的态度，而今天似乎已经到了用这样的心态去评价胡适在中国思想文化史所起正负两方面作用的时候了。

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极力主张要有“高远之思想”、“真挚之情感”这两种因素，认为“情感者，文学之灵魂。文学而无情感，如人之无魂，木偶而已，行尸走肉而已”，“思想之在文学，犹脑筋之在人身。人不能思想，则虽面目较好，虽能笑啼感觉，亦何足取哉？文学亦犹是耳”。他的不少散文在表达思想方面，确实是做得相当成功的，这正是他的散文至今还有生命力的缘故。然而他同样强调的文学创作的感情问题，在自己散文写作的实践中是做得并不十分成功的，还不如自己浅显明白地进行说理的能力。

这一点不仅在散文创作中间，就是在大名鼎鼎的《尝试集》全部诗作里面，也同样是明显地表现出来。著名诗人朱湘就批评他“意境平庸”，说是“胡君的诗没有一首不是平庸的”（《尝试集》），美籍华裔学者周策纵也认为“胡适诗最大的特点是欠缺热情或挚情”（《论胡适的诗》），都从审美应该是全部感情激动的历程这种视角得出的结论。胡适确实是很强的学术素养，他喜爱和擅长说理，于是就成了杰出的学术家，却比较欠缺艺术的气质，不太擅长抒发满腔的

激情，因此就并未成为杰出的散文家，尽管他也充分认识到没有感情色彩的文学犹如“行尸走肉”，认识到艺术创作必须“动人”，要有“‘逼人’的力量”（《什么是文学》），然而他在这方面实践的结果却并不十分理想。

这自然是就总体的情况而言，如果要具体论列起来，胡适也有个别写得颇具感情色彩的散文，像在他的《四十自述》中间，叙述自己母亲的艰苦经历，以及与他相依为命，对他慈爱而又严厉地教导的过程，读起来相当动人，这是因为他始终怀念着自己母亲的恩情，而且他母亲的形象和品性，早已刻骨铭心地留在自己的记忆中，正是这种深沉的母子之情，使他在在这方面写下的篇章，达到了自己最佳的抒情境界，自然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可惜的是像这样的篇章实在太少了，想要经常达到这样的境界，是由人们长期蕴涵、凝聚与升华而成的气质所致，也许是很难强求的。

从《四十自述》中这些成功的段落，说明了应该集中精力选择具有强烈感情色彩的细节。大凡出色的散文家，总是驾驭着一手含情脉脉而又独具个性风格的文字，正是用这种汨汨流淌着满腔激情的文字，去叙述某些本身就包含着情感的生活细节，才能够打动和震撼读者，甚或达到使读者如醉如痴的地步，胡适在这方面注意得不够，所下的功夫实在太少了。他的文字表达能力是堪称上乘的，在明白晓畅中颇具可以触摸得到的形象感，然而他这样遣词造句的主要驱动力，还是侧重于说明生活的实况，在这种生动的形象中间，感情的含量确实是很少的。

胡适写人物的不少散文就属于这种情况，譬如说他的《追想胡明复》，就很善于择取不同的细节来表达，像写他在察看

录取留美官费生的榜文时，先发现很像自己名字的‘胡达’二字，后来才看到自己的名字，说是“几乎害我空高兴一场”，描绘得跌宕有致，生动传神，应该说是相当成功的细节描写，然而从这细节中还无法表现他与胡明复（即胡达）的感情交往。这篇散文还抒写了与胡明复留美同学时的有趣情节，细节的结构能力与文字的表达功夫都是好的，可惜的是直至写到胡明复突然病死，都始终未能很好表现出他们之间究竟有多少浓郁的友情。他大部分写人物的散文，都缺乏这种含着感情色彩的细节描写。胡适强调文学创作的“三个要件”中，就有“美”这一条，认为这是“明白之至，有逼人而来的‘力’”（《什么是文学》），如果说他已经做到了“明白之至”这一点，“逼人而来的‘力’”却是很缺乏的，根本原因是感情力量不够充沛。

胡适描写自然风光的游记，也同样存在着这种情形。他十分欣赏《老残游记》中写黄河雪景的那段文字，因此在自己的写作实践中，有时也能注意去进行清新传神的风景描写，如《庐山游记》写白鹿洞铮淙的小溪，也多少有点儿韵味，却并未很好透露内心的情绪与感受，而且这样的文字往往也很少展开，廖廖几句，倏忽消逝，在整篇作品中占的比重实在太少，却把更多的精力用去考据这儿的种种掌故，枝蔓而又沉闷，跟充满情感的审美活动显得隔了一层，又一次证明了胡适学术家的心灵，大大地压倒自己艺术家的气质。

正因为胡适是深受西方近代资本主义文明熏陶，却又保存了中国传统文化深厚影响的学者，而在政治方面他又终生依附于国民党政权，所以想要深入地了解他全部的思想和文化观点，判断和指出他谬误的见解，总结他合理和有意义的部分，

是要认真阅读他全部的政论和学术著作才有可能做到的。当然，胡适的散文也不能不勾勒出他精神和心理的许多侧面，这样就可以充当这方面重要的文献材料，除此之外由于他的散文具有前面所说的艺术价值，也就可以提供作为审美的鉴赏和研究。

1992年8月4日于北京

目 录

归国杂感·····	(1)
易卜生主义·····	(8)
贞操问题·····	(26)
新生活·····	(36)
爱情与痛苦·····	(39)
非个人主义的新生活·····	(40)
不老·····	(50)
什么是文学·····	(55)
《尝试集》四版自序·····	(59)
十七年的回顾·····	(63)
《吴虞文录》序·····	(69)
《蕙的风》序·····	(73)
评新诗集·····	(81)
北京的平民文学·····	(94)
《天乎帝乎》序·····	(95)
读梁漱溟先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	(96)

孙行者与张君勱	(116)
差不多先生传	(120)
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	(123)
萨各与樊才第的案件附记	(136)
麻将	(139)
追想胡明复	(142)
名教	(150)
《小雨点》序	(161)
人权与约法	(165)
《人权论集》序	(172)
《王小航先生文存》序	(174)
九年的家乡教育	(177)
追悼志摩	(194)
赠与今年的大学毕业生	(204)
领袖人才的来源	(210)
独立评论的一周年	(216)
信心与反省	(221)
再论信心与反省	(228)
三论信心与反省	(235)
“旧瓶不能装新酒”吗？	(242)
今日思想界的一个大弊病	(246)
中华民国华北军第七军团第五十九军抗日战 死将士公墓碑	(252)
充分世界化与全盘西化	(256)
《人与医学》的中译本序	(260)
谈谈“胡适之体”的诗	(266)

高梦旦先生小传.....	(273)
读经平议.....	(277)
《师门五年记》序.....	(282)
《傅孟真先生遗著》序.....	(285)
捶煮自然的灵物.....	(289)
一个防身药方的三味药.....	(295)
致苏雪林、高阳.....	(301)

归国杂感

我在美国动身的时候，有许多朋友对我道：“密司忒胡，你和中国别了七个足年了，这七年之中，中国已经革了三次的命，朝代也换了几个了。真个是一日千里的进步。你回去时，恐怕要不认得那七年前的老大帝国了。”我笑着对他们说道：

“列位不用替我担忧。我们中国正恐怕进步太快，我们留学生回去要不认得他了，所以他走上几步，又退回几步。他正在那里回头等我们回去认旧相识呢。”

这话并不是戏言，乃是真话。我每每劝人回国时莫存大希望；希望越大，失望越大。所以我自己回国时，并不曾怀什么大希望。果然船到了横滨，便听得张勋复辟的消息。如今在中国已住了四个月了，所见所闻，果然不出我所料。七年没见面的中国还是七年前的老相识！到上海的时候，有一天，一位朋友拉我到大舞台去看戏。我走进去坐了两点钟，出来的时候，对我的朋友说道：“这个大舞台真正是中国的一个绝妙的缩本模型。你看这大舞台三个字岂不很新？外面的房屋岂不是洋房？这里面的座位和戏台上的布景装潢又岂不是西洋新式？但是做戏

的人都不过是赵如泉，沈韵秋，万盏灯，何家声，何金寿这些人。没有一个不是二十年前的旧古董！我十三岁到上海的时候，他们已成了老角色了。如今又隔了十三年了，却还是他们在台上撑场面。这十三年造出来的新角色都到哪里去了呢？你再看那台上做的《举鼎观画》。那祖先堂上的布景，岂不很完备？只是那小薛蛟拿了那老头儿的书信，就此跨马加鞭，却忘记了台上布的景是一座祖先堂！又看那出《四进士》。台上布景，明明有了门了，那宋士杰却还要做手势去关那没有的门！上公堂时，还要跨那没有的门槛！你看这二十年前的旧古董在二十世纪的大舞台上做戏；装上了二十世纪的新布景，却偏要做那二十年前的旧手脚！这不是一副绝妙的中国现势图吗？”

我在上海住了十二天，在内地住了一个月，在北京住了两个月，在路上走了二十天，看了两件大进步的事：第一件是“三炮台”的纸烟，居然行到我们徽州去了；第二件是“扑克”牌居然比麻雀牌还要时髦了。“三炮头”纸烟还不算稀奇，只有那“扑克”牌何以会这样风行呢？有许多老先生向来学A,B,C,D,是很不行的。如今打起“扑克”来，也会说“恩德”，“累死”，“接客倭彭”了！这些怪不好记的名词，何以会这样容易上口呢？他们学这些名词这样容易，何以学正经的A,B,C,D,又那样蠢呢？我想这里面很有可以研究的道理。新思想行不到徽州，恐怕是因为新思想没有“三炮台”那样中吃罢？A, B, C, D, 不容易教，恐怕是因为教的人不得其法罢？

我第一次走过四马路，就看见了三部教“扑克”的书。我心想“扑克”的书已有这许多了，那别种有用的书，自然更不少了，所以我就花了一天的工夫，专去调查上海的出版界。我

是学哲学的，自然先寻哲学的书。不料这几年来，中国竟可以算得没有出过一部哲学书。找来找去，找到一部《中国哲学史》，内中王阳明占了四大页，《洪范》倒占了八页！还说了些“孔子既受天之命”，“与天地合德”的话。又看见一部《韩非子精华》，删去了《五蠹》和《显学》两篇，竟成了一部《韩非子糟粕》了。文学书内，只有一部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是很好的。又看见一家书目上有翻译的萧士比亚剧本，找来一看，原来把会话体的戏剧，都改作了《聊斋志异》体的叙事古文！又看见一部《妇女文学史》，内中苏蕙的回文诗足足占了六十页！又看见《饮冰室丛著》内有《墨学微》一书，我是喜欢看看墨家的书的人，自然心中很高兴。不料抽出来一看，原来是任公先生十四年前的旧作，不曾改了一个字！此外只有一部《中国外交史》，可算是一部好书，如今居然到了三版了。这件事还可以使人乐观。此外那些新出版的小说，看起来，实在找不出一部可看的小说。有人对我说，如今最风行的是一部《新华春梦记》，这也可以想见中国小说界的程度了。

总而言之，上海的出版界——中国的出版界——这七年来简直没有两三部以上可看的书！不但高等学问的书一部都没有，就是要找一部轮船上火车上消遣的书，也找不出！（后来我寻来寻去，只寻得一部吴稚晖先生的《上下古今谈》，带到芜湖路上去看。）我看了这个怪现状，真可以放声大哭。如今的中国人，肚子饿了，还有些施粥的厂把粥给他们吃。只是那些脑子叫饿的人可真没有东西吃了。难道可以把《九尾龟》，《十尾龟》来充饥吗？

中文书籍既是如此，我又去调查现在市上最通行的英文书籍。看看去，都是些什么萧士比亚的《威匿思商》，《麦克